

第七章 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一、东北人民奋起抵抗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无比仇恨。从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踏入沈阳那天起，东北人民就展开了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九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发表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也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发表宣言，并于九月二十一日发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和目前党的任务”的决议，号召人民群众和军队起来救国，组织民众政府，自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又做出决议，提出用武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党的号召与影响之下，白山黑水之间，遍地燃起民族解放战争的抗日烽火；从城市到乡村，到处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吼声。各种抗日武装如游击队、义勇军、红枪会、大刀会、山林队等象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①可以说，日本侵略者使东北殖民地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35页。

化的过程，也正是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英勇的抗日斗争的过程。

1 嫩江桥战斗

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辽、吉之后，准备收买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做汉奸，由张出兵黑龙江。这样既可掩人耳目，欺骗舆论，又能兵不血刃地达到全部侵占东三省的目的。张海鹏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甘心做侵略者的走狗，接受日本的军火援助（仅新大盖枪就有两万多枝），自恃装备精良，悍然北下袭取黑龙江省。

十月十六日拂晓，张海鹏的前锋部队抵达嫩江桥南端时，黑龙江省守军愤于张海鹏的丧心病狂，认贼做父，广大士兵不听上级命令，自动将江桥炸毁三孔，并以猛烈的炮火进行袭击，阻止其北上。张的三个团趁机也纷纷反正。

日本侵略者眼见侵占黑龙江省的计划破产，除了继续以四列车军械、十万元日币援助张海鹏外，还亲自出马。十一月一日，日本驻吉林第十六联队长滨本喜三郎大佐率领步兵两个大队、野炮兵一个大队、工兵一个中队，借口“匪患”逼进嫩江桥。日本侵略者曾于十月二十九日向黑龙江省代主席兼省防司令马占山提出通牒，威胁说，洮昂路是向满铁借款修成的，此刻江桥被炸，交通断阻，于满铁有利害关系，不能坐视不管。十一月二日，日本驻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少佐，又向马占山送来通告，蛮横地要求嫩江桥不得为战术使用。十一月三日晚，日本飞机突然向中国军驻地大兴站投弹，四日，便明目张胆地向中国军阵地扑来。中国军队虽兵员单薄，军械缺乏，但士气激昂，激战十余小时，打退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接着，五日打了一场恶战，中国军队几乎全歼了滨本步兵联队，而高波骑兵队死伤也很重。日本又调集兵力，命令关东军

第二师团主力前来支援。从十六日早开始，洮昂线嫩江桥战事，双方互有进退，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中国军队实行战略转移，退离江桥、大兴，准备固守三间房。日军也准备于十七日在三间房发动一场大血战。本庄繁给金谷参谋总长的报告中说：“对黑龙江军事，已达险恶之境，关东驻军已认为到达应取最后决意击破之时期……”。十七日晚十时，日本侵略军以一部分兵力攻打中国军队第一道正面防线，又以一部分兵力，外配坦克袭击中国军队的侧翼，攻打中国军队的第二、三道防线。中国军队据壕抗敌，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特别是挫败了敌骑兵大队十余次的猛扑。夜半，敌人坦克攻进阵地，子弹密集，连发如雨，壕外掩蔽物如木桩、铁网全被毁平，防御壕被冲塌，抗日将士们只好跃身跳出战壕应战，骁勇呼杀，向敌人冲锋五次。相持至拂晓，因弹药用尽，黑龙江省防军只好且战且退。十八日凌晨二时，黑龙江省防军又猛力反攻，夺回原阵地。十八日清晨，日本侵略军的先锋部队多门师团，以八辆坦克开路，三十多门大炮猛射，重又发动攻势，黑龙江省防军官兵在敌人密集的炮火下，主要依靠步枪还击，阵地失而又夺，夺而又失。上午十时后，日军又增派飞机十二架，坦克十二辆，大施空陆立体战之威力，对中国军队进行上下前后之夹击，战至午后二时，战壕全部被毁平，抗日将士只好持枪与敌人展开肉搏，枪上没有刺刀，只好用枪柄击打，子弹也用尽了，不得不于十八日下午六时退却。

当时愤于蒋介石采取卖国的不抵抗主义，东北军民自发起来抵抗日军，民气沸腾。大家艰苦奋战，有很多感人的事迹。一次，日本飞机欺我中国军队没有高射炮，低飞扫射，逞凶一时，激怒了战士。中国军队二十人为一组，都持枪卧地仰击，飞机竟中弹落地，两翼弹痕有四十六处之多。也有的战士，徒手冲过火线，从敌人手中硬是夺过两架机枪。连日本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嫩

江桥之战是日本侵略东北以来死伤最惨重的一次，他们公布的统计数字是：死伤一百八十五人，冻伤一千人。^①

嫩江桥之战既挫败了日军咄咄逼人、不可一世的侵略凶焰，一时阻止了侵略军的北进；又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酷爱自由，勇敢顽强的战斗气概。这种以血肉和敌人相拚的民族正气、爱国精神，曾博得世界舆论的称赞，当时英国《每日邮报》、《密勒氏评论报》均争先登载嫩江桥抗战的消息。虽然最后中国部队撤离了嫩江桥，但此抗日壮烈之举对国际影响很大，尤其是对当时大半壁河山已沦入敌手的东北人民影响更为巨大。自此役后，整个东北大地，民气更加激昂，军心更加振奋，继之而起的血战，不乏其例。

中国共产党始终赞助嫩江桥的抗战。当时中共满洲省委和北满特委曾动员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其它阶层爱国分子，组成“抗日援马代表团”，奔赴战地慰问，积极宣传抗日，进行人力、物力支援，甚至派志愿兵参加战斗。需要指出的是，马占山在广大民众特别是士兵的推动下，违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意志，领导和支持了这次抗战，并在十七日的最后鏖战中，马占山“誓抛热血头颅”，亲临前线督战，率手枪队猛力反攻，夺回了阵地。当时面对日军的无理挑衅与其势汹汹的通告，马占山大义凛然，不为所动。

2 义勇军、救国军等抗日武装

面对日军的侵略进攻，当时东北各阶级和阶层的动态是：第一，东北广大人民群众热爱祖国，坚决要求抗日；第二，东北上层

^① 参见藤原彰著：《日本近代史》第三卷第42页。

的统治阶级也感到威胁，某些军阀、地主开始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逼，影响自己的统治与土地财产，所以亦有一些抗日要求；第三，共产党坚决发动人民起来抗战，当时在罗登贤同志领导下，党派了许多干部、学生和工人到各地去宣传抗日，到处组织抗日义勇军，形成了东北全面抗日的大好形势。

嫩江桥的血战，揭开了大规模武装抗日的序幕。在日本侵略魔爪尚未伸到的北满、吉东地区掀起了自动抵抗的浪潮；一部分东北军也纷纷起来抗日，如苏炳文在海拉尔的东北屯垦部队，称为黑龙江省抗日军；中东路护路军丁超二十八旅，镇守依兰的李杜二十二旅，邢占清的二十四旅，宁安张振邦的二十一旅也都打起抗日的旗帜；守备吉林市的冯占海、李海青等警卫队打出了吉林抗日自卫军的旗号。辽宁东部驻军唐聚五、李春润部队也宣布抗日，组成了辽宁民众自卫军。还有一部分军队和民众结合起来组织起抗日队伍。驻在吉林延边的原吉林陆军第十三混成旅第七团的老三营，以王德林等人为首组织了暴动，在延吉一带很快就发展到数万人，组成抗日救国军，到处打击日本侵略者。辽南三



被抗日武装袭击的三道沟日本领事馆分署

角地带带有邓铁梅、王凤阁、苗克秀等东北救国义勇军。在辽西和热辽边境有耿继周等反日义勇军。此外，各地保安队、警察队也纷纷起来抗日。有些地区工人、农民使用原始武器，利用宗教行会活动，组织“大刀会”、“红枪会”、“黄枪会”，“救世军”等组织，积极进行抗日斗争。就是那些在当时军阀割据、内战不已、民不聊生等畸形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胡匪”，如长江好、三江好、天下好、平南洋、占中华、老双胜、东双胜等也都打起“反日山林队”的旗号，到处阻扰敌人的行动。据满洲省委一九三二年四月份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后到一九三二年初，北满、吉东、东满地区的抗日武装达三十万人，辽东南和辽西近十万人，总计四十万人。这四十万人到处打击敌人，曾创造出不少辉煌的战绩。

辽西义勇军全歼了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称之为“不战而胜”的“权威”古贺骑兵联队。“九·一八”事变后，沈阳陷于敌手，辽宁省政府迁移到锦州交通大学内办公。十二月下旬，又陆续撤入关内。当时日军气焰十分嚣张，在辽宁如入无人之境。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关东军占领锦州后，其第八师团骑兵联队长古贺中佐，又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六日午后率二百余骑进驻锦西。一月八日晚，古贺准备就绪，要出发征剿辽西义勇军，并嘱咐赶制“凯旋”大旗，准备欢迎皇军“得胜”回来。一月十日早八时，古贺亲率骑兵百余名向西出发，得意洋洋。不料在一狭路口，中辽西义勇军埋伏，日军骑兵不得施展，被打得人仰马翻，首先古贺被击毙，其余敌骑死伤狼藉，无一幸免。义勇军还获悉，古贺走前曾派松尾小队骑兵二十七人前去锦州取弹药、给养。下午返回时，也遭到义勇军伏击。枪响后各村报信，四方约百余人来会，不少没枪的人拿锹、镐、锄头参战，重重包围，一举消灭，至此全歼了古贺骑兵联队。

辽东三角地带邓铁梅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拥有



邓铁梅

四千多人，编成三个步兵团，一个大刀队，一个侦察队。十二月，邓亲率大刀队五百人主攻安奉线重镇凤凰城，缴步枪三百余支，还有轻机枪与迫击炮等。以后又和平进驻庄河、大孤山。随着抗日情绪的高涨，邓的队伍不断扩大，至一九三二年初，已拥有一万三左右，下属十八个团，三个支队，一个大刀队。这支队伍不仅打破了日军的“讨伐”，还成功地突袭了岫岩城。特别是当一九三三年初，敌人再次

“讨伐”时，邓铁梅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所属李海山部六百余人，被围于沙金沟老平顶，同敌死拚，坚持六昼夜，全部壮烈牺牲。邓铁梅本人也一再拒绝敌人招抚和诱降，后被劫持谋杀而死，死前曾题词云：“七尺躯何足惜哉，四省土几时收复？”

活跃于辽南的义勇军在斗争中成长壮大，至一九三二年春达到高潮，共计有九个路军，三个支队，所属不下三万人。他们以海城为中心，活动范围较广，东到岫岩、凤城与邓铁梅呼应，南到营口、大石桥，西到台安、磐山，这一带交通要道与农村皆在义勇军严密控制之下，平时组织小分队，不分时间、地点随时奇袭敌人，炸火车，扒铁路，烧兵站，甚至袭击沈阳飞机场，扰得日伪统治当局日夜不得安宁。

一九三二年冬，吉林境内几支东北军余部，由抱定抗日决心的李杜主持，在哈尔滨召开联席会议，成立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包括王德林的抗日救国军在内，大家公推李杜任总司令。这支部队首战双城。一月三十一日，自卫军与前来进犯哈尔滨之日本多门第二师团所属步兵第三旅团在双城堡发生激战，自卫军从三面发起突袭，先以猛烈的炮火和炽密的机枪扫射，继以刺刀、手榴弹发起白刃战，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伤亡很重。这是继嫩江桥战役之后的又一次胜利。接着，一九三二年三月，方正一战，打伤了日本军事侵华的先锋多门师团长。

战斗在吉东的王德林、吴义成之“抗日救国军”，自一九三二年元宵节开始，三打敦化城，与日军争夺长图路之咽喉地带，使敌死伤近四百余人。接着又打额穆和蛟河，缴获敌人捷克式机枪二十一挺，三八式机枪七挺，大小枪支一千六百余支。三月，日方由田野少将亲率号称万人大军追击救国军，救国军决定采取引敌深入、四面夹击的办法，在南湖头墙缝大摆口袋阵，歼灭敌人三千多人，缴三八式步枪上千支。接着又在松乙沟展开了围歼逃敌的战斗，利用春天的干旱气候以及该地草高、路窄、风大的特点，进行火攻，使残敌无路可逃，大振了抗日的声威。

冯占海率领吉林省抗日自卫军，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兵分两路袭取哈尔滨，哈之外围蜚克图的伪军闻风而逃，义勇军进抵香坊。日军广濑师团配有伪军几个旅，调动几十辆装甲车和二十余架飞机，双方激战几小时，吉林义勇军从侧面进击，将日伪前头部队打退，乘胜猛攻，截获数辆装甲车，给敌人骄横气焰以沉重打击。十月中旬，冯占海所部几万人又到达吉林市郊，在小白山、温德河子一带展开激战，同时一部分队伍开进长春市郊米沙子、布海一带与日军交火。冯军袭击吉、长二市，政治影响很大，对日伪的统治中心是个严重的威胁，闹得军政要员们惶惶不可终日，

夜间只好穿着衣服，枕着手枪睡觉。曾迫使日伪最高当局不得不做出准备逃跑的决定。当时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多田骏大佐就曾在总务厅次长会议上提出：“匪军可能进攻到新京来，最好把行李整理一下。”这一告急的宣告，吓得这群日伪要员一时呆若木鸡。^①

从日伪官方报告来看：自“九·一八”事变到一九三三年二月止，日伪军战亡人数为六千五百四十一名，平均每月讨伐抗日力量出动一千五百次，阵亡官兵七十三人，日军死尸由中国东北经神户运回国内，每月平均五十具。^②

到一九三三年夏初，四十万人以上的各种抗日军和蓬蓬勃勃的抗日运动，逐渐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击败，斗争暂时进入低潮。但所余其它抗日组织并没有完全被摧毁，它们正在酝酿着新的斗争风暴，准备再一次掀起斗争高潮。

3 土龙山农民武装暴动

黑龙江省松花江、牡丹江、乌苏里江汇口处的三江地区有一个依兰县。这里有着一望无际的肥沃大平原，是天然的大粮仓，在战略上也具有重要意义。伪满洲国建国伊始，关东军就做出计划，准备把日本国内预备役军人组成屯垦军，以武装移民的方式，分期分批移入东北三江平原地区。

一九三二年十月，第一批武装移民团四百九十二人到佳木斯，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转入永丰镇定居，一九三三年七月，第二批开始迁入湖南营。

关东军为了进行移民，大规模地抢占土地，他们以东亚劝业

^① 古海忠之：《满洲国施政的展开和结局》，见岸信介主编《啊，满洲》。

^② 巴黎《救国时报》第5期《东北四省四年来的反日游击战争》。

公司的名义，不分熟地、荒地，一律按每垧一元钱的所谓地价，强行把土地征购去，对迟迟不交地契的人，采取高压手段：日本士兵闯进各家，到处翻箱倒柜搜找，有的用枪托捣毁了墙壁，把藏起来的地契拿走。这种形势使中农、贫农感到无路可走，忍无可忍。地主们也感到失去土地，断了剥削之路，是个致命的威胁。于是以三区区长兼自卫团长谢文东为首，准备在土龙山暴动。恰好日本关东军派人来土龙山搜掠财物，这件事就成为直接导火线。一九三四年三月五日，谢文东组织起一个拥有七百人的骑兵队，三月九日袭击了土龙山警察署，解除了二十多名警察的武装。自此，土龙山农民开始了武装暴动，组成东北民众自卫军，参加者达三千人，震动比较大。一九三四年七月二日，《纽约日报》也发了消息。^①

当时依兰的驻军是哈尔滨姬路第十师团第六十三联队，联队长饭塚朝吾大佐带领一个小分队和少数伪军与警察，于十日上午前往土龙山，准备说服拉拢谢文东，半路上汽车被深沟拦断了去路。车子刚停下，立即遭到伏击，饭塚朝吾被打死。当场除两名日军逃出外，其余也都被打死了。消息传到依兰，联队又派了增援后续部队，途中又中埋伏，两面受夹击，只好抱头鼠窜。农民自卫军破坏了交通线和联络设施，断绝了依兰对外联系。过了一个月，消息才传到哈尔滨。关东军西尾参谋长闻讯后大怒，用军刀敲着地板，怒气冲冲地吼叫：“一旦拔出了的日本刀，不消灭敌人是不会收起的”。^②下令派出大批队伍，在飞机和战车的掩护下，对土龙山一带开始报复性大讨伐。土龙山附近十七个村庄被炸平，五千多农民被炸死。武装暴动的农民经受住了这场残酷的战斗考

^① 见远山茂树等著《昭和史》注释，三联书店，1958年，中译本。

^② 沈本实著：《土龙山事件》，见岸信介主编《啊，满洲》，第147—150页。

验，他们越战越强，队伍发展到两万人，推动了桦川、富锦、勃利、宝清一带的农民运动。各种形式的农民暴动不断发生，对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争。

4 工人的反抗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工人阶级也积极举起抗日斗争的旗帜。当日本开始占领沈阳、蚕食辽宁时，沈阳兵工厂，本溪、抚顺、鞍山等大的厂矿工人，以及安东丝厂工人，辽阳纺织工人，北宁路、南满路的工人纷纷罢工，反对日军侵占东北。他们在斗争中不惜流血牺牲。抚顺煤矿工人因抗日被枪杀，安东还发生了中国工人与日本工头的武力冲突，辽阳纺织厂与北宁、南满铁路工人大罢工之后，一部分自动组织义勇军，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在全东北波澜壮阔武装斗争的基础上，几个主要城市的工人群众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

旅大工人阶级素有光荣的斗争传统，早在一九二三年就成立了中华工学会，在恽代英、关向应等同志的组织指导下，工人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日本侵占东北后，党为了加强城市工作，派了不少同志深入大连码头、机车铁道工厂等单位，发动工人不断寻找机会给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以焚毁日军的大量军用物资为目标的大连放火团，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工人们用一种香皂形的固体定时爆燃火药，在码头、军用仓库等重要设施放火。为躲过敌人的搜查，他们将这小块火药卷进大煎饼里，一边走，一边拿着吃，巧妙地混过日军的耳目，带进了日本陆军仓库。一九三八年六月，在大连码头用这种办法烧了四个主要仓库，即一二四仓库所装的布匹、毛巾；一二六仓库所装的茶叶、猪鬃、芝麻、糖、蛋黄，一二八仓库所装的水银、机器等。当时大火漫天，共

烧了三天三宿，日方损失极为严重。据救火的消防队长高维仁说：“当时火烧的很大，我们把四条水笼带拉到仓库旁打算救火，但另一个又着起来，仅消防队员从火里逃出来，水笼头都烧在火里了，这场火太大了，铁道都烧弯了，仓库房顶铁皮盖，被火冲上天去，象红纸一样飘荡，没有办法救火，只好看着烧，东西损失老了。”^①一九四〇年六月，在周水子陆军仓库放了最后一次大火，烧毁日军军用毛衣五万套，军用饼干上千箱，据估计损失当在日币八百万元以上。不仅码头起火，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甘井子石油工厂也被放了火，烧了六个小时，毁掉六万多桶石油、洋蜡原料。据《日日新闻》报载当时情况是“大火漫天，黑烟笼罩了大连湾上空，出动了满洲石油公司防护团、大连消防署、金州消防署所有的消防队，但也施救无效。”估计日方这次损失约在日币七百万以上，折合当时物价，能买飞机二十余架。^②象这样的大火灾，当时在大连屡屡发生，据大连《日日新闻》报统计，约有五十余次，损失日币二千多万元。^③

在鞍钢这个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战略物资的重要基地，日伪一向控制很严，广大工人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三年先后举行了十次较大的罢工斗争，一度使日伪扩大侵略战争所急需的钢铁生产遭到破坏。

铁路，作为交通大动脉，在铁路工人与抗日武装相配合下，经常被破坏，处于“梗塞”状态，使日军急需调运的军用物资堆积如山。吉海铁路五百名养路工人，在党的直接组织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扒铁路，毁桥梁，一个时期使日军的东路运输瘫痪。他们还为抗联购买和运送武器以及其它军需品，甚

① 见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藏东北地方史资料。

② 见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藏东北地方史资料。

③ 见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藏东北地方史资料。

至配合抗联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如一九三三年夏天，蛤蟆河子、老爷岭地区几十名铁路工人协助游击队，在老爷岭隧道阻击一列火车，经过激烈战斗，俘虏几十人，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武装了游击队。对此，敌人在《满洲共产匪之研究》一书中曾做如下记载：“一九三三年三月，第三十一号及第三十二号保线丁场所属保线工人，拔掉老爷岭洞口北侧路线的道钉十五根，使列车脱轨，援助了红军的袭击。”

哈尔滨落入敌手不久，发生了一起电车工人大罢工事件：事情是伪防卫司令部一个姓孙的营长乘电车不买票，与售票员共青团员张洪玉发生冲突，当时动手打了张洪玉，还扭送宪兵队，又打个半死，才抬回电车公司。广大电车工人见此情况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当晚三百多名工人聚集在食堂里开会，研究罢工事宜。在中共满洲省委和满洲总工会的领导下，工人们提出了惩办打人凶手、赔偿医药费、增加工资、不准无故开除工人等几项要求，并一致通过决定，从第二天开始罢工。当时在满洲省委工作的赵一曼等同志投入了这场罢工斗争，组织工人写了不少标语，还连夜编写赶印了“告哈尔滨市人民书”等传单，广泛进行抗日宣传。第二天，全哈尔滨市的电车都停驶了，市内交通断绝，大街小巷到处贴满或撒满反日的传单、标语。各行各业的爱国市民们，争先恐后地抢着看，日伪宪兵、警察赶也赶不散。事先毫无准备的敌人震惊了。伪防卫司令部威吓工人要他们马上复工，但是没有结果，又害怕发生更大的行动，只好作了表面的让步，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各项要求。坚持两天半的电车工人罢工以胜利而告终，使日伪的骄横气焰受到了打击。

正当日伪大吹大擂，经过所谓“治安肃正”，在满洲已确立“新秩序”的时候，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在滨洲线的黑岗车站发生了一件有组织有计划的重大撞车事件。五〇一次货车从尾部撞

到二五〇一次日本军事临时列车上，军临车起火烧毁四辆，倒翻十几辆，弓起六、七辆。乘这列车的是刚从太平洋南线上换防下来的一个旅，全部日本军官五十多人，仅剩下两个活的。日军的大佐旅团长只剩下一口金牙和一只靴子。四十多匹马，几百只短枪和子弹，三个车皮的被服和口粮，都在黑岗站报销了，损失极为惨重。日本关东军司令闻讯后，异常惊恐，专门派一个少将到昂昂溪来处理善后。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传诵着为这件事而光荣牺牲的共产党员、优秀铁路工人——站长、扳道员、军临车长等人的英雄事迹。

工人群众的抗日斗争，除了组织义勇军、公开进行武装反抗外，在党的领导下，还极其隐蔽地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最常见的是从事破坏生产的各种活动。有力地配合了党领导的武装斗争。

二、东北抗日联军

1 磐石、珠河等游击队的发展壮大

“九·一八”事变开始时，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工作的不少负责同志受错误路线影响，不会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抗日，一仍过去那些老办法，搞游行示威，飞行集会，街头讲演，散发传单，以至于准备在哈尔滨召开工农兵代表会议，召集七次都没开起来。一九三二年初，中共中央出版的“红旗”报上发表了周恩来同志以“伍豪”笔名写的文章《用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出要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当时中共中央驻满洲省委代表兼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认真贯彻这一精神，一方面动员大